

汉语古音学比较研究

——从顾炎武到高本汉的模式演进

陈芳 著



汉语古音学比较研究

——从顾炎武到高本汉的模式演进

陈芳著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海峡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语古音学比较研究:从顾炎武到高本汉的模式演进/陈芳著. —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15.7
ISBN 978-7-5550-0574-2

I. ①汉… II. ①陈… III. ①汉语—上古音—研究
IV. ①H1.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45171 号

汉语古音学比较研究
——从顾炎武到高本汉的模式演进

陈芳著

责任编辑

出版发行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海峡文艺出版社

经 销 福建新华发行(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社 址 福州市东水路 76 号 14 层 邮编 350001

发 行 部 0591-87536797

印 刷 福州万达印刷有限公司 邮编 350008

厂 址 福州金山橘园洲工业园仓山园 19 号楼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字 数 240 千字

印 张 14.5

版 次 2015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50-0574-2

定 价 3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承印厂调换

序

马重奇

陈芳博士于2001年硕士毕业后，留在本校学报编辑部工作。同年，文学院成功申报了汉语言文字学专业的博士点，她以优异的成绩进入博士点继续深造，三年后顺利取得博士学位。她的博士学位论文《姚文田古音学研究》获校优秀学位论文一等奖、省优秀学位论文二等奖的佳绩。

陈芳博士出色完成各项编辑业务：曾获“全国学报优秀编辑”等诸多奖项；2007年通过副编审的评聘，并担任学报副主编；2010年，她负责的“修辞学大视野”专栏入选教育部名栏……另一方面，她一直坚持教学科研工作，2007年获得硕士生导师资格，参与研究生的培养工作；2013年1月，她对自己提出新的挑战，从学报编辑部调回文学院，将工作重心转移到教学与科研工作上来。

《汉语古音学比较研究》是她多年来教学与科研所得，也是她回归文学院后的新起点。该书特色在于，既有宏观的史略研究，又有微观的专题研究，更有深度的理论思考。

绪论部分清晰地勾勒了汉语古音学的发展脉络：清代以前，古音学经历了漫长的萌芽期，这一阶段古音学尚未成为一门独立的学问；清代初期，顾炎武将古音学推向成熟规范的发展阶段；清代中后期，古音学进入了“前修未密，后出转精”的鼎盛阶段，出现了



许多重要的古音学家与古音学著作；清代以后，高本汉带来西方历史比较语言学的研究方法，系统地研究汉语上古音，这是在西学东渐的大环境下，汉语古音学保持生机、延伸研究空间的必然选择。

第一、二章将宏观的梳理与微观的研究有机结合起来。

顾炎武是清代古音学的奠基人，他使古音学真正发展成为一门成熟的学问，在古音学史上的地位至今无人可比。第一章首先探讨：顾炎武的研究模式如何形成，在同时代的研究模式中如何脱颖而出，如何引领清代古音学的发展？在此基础上，作者从自己曾经研究的姚文田古音学入手，了解清儒古韵分部的概貌与差异，介绍上古声调的争论情况；进而从清儒处理通转合韵问题时遇到的困境入手，分析顾炎武研究模式的局限。

作为一名国外语言学家，高本汉有着完全不同于清儒的全新视角。顾炎武将古音学带入了精密的发展空间，他的研究是严密的，是有待填充的经典范式；高本汉则展示了古音学研究的无限可能，他的研究是开放的，是有待修正的粗糙模式。该书的第二章集中探讨：百年来的学者如何批判和发展高本汉的谐声原则，如何不断修正和发展单声母、复声母、介音、主要元音、韵尾的研究成果？

第三章是理论反思，对古音学的研究对象、立论基础加以思考与辨析，对历史语言学的贡献与古音学的新成果加以整理，对古音学是否存在研究范式、存在什么样的研究范式加以讨论，对古音学的发展路径加以观察与预测。其中的不少观点虽不一定十分成熟，却值得关注：

其一，研究上古音没有可参考的韵书，只能对古代典籍中的韵语（《诗经》、《楚辞》及先秦韵文）进行系联。古音学家对上古音的界定不一，不足为怪。

其二，绝对的真理是不存在的。“古音韵至谐”和“同谐声必同部”只能存在于同质的语言中，但任何的文献都不可避免地记载着不同时空的异质语言的内容，上古的韵文材料与谐声材料也同样反映了不同时地的语音要素。但若被这些异质的成分束缚了手脚，

研究便无法开展。“古音韵至谐说”等理论的重要价值在于，让人们在研究复杂的古文献材料时有章可循，并在研究中不断发展与完善古音学的理论。

其三，清代古音学为什么最终走向衰微？为什么把高本汉的研究成果看成现代音韵学和方言学研究的里程碑著作？高本汉开启了用历史比较语言学研究汉语史的大门，以新的研究视角打开了汉语史研究的巨大空间。透过这扇门，便能读懂清代古音学的得失。完成了对历史文献的极致分析，是清代古音学之所得；止步于对汉语的孤立研究，是清代古音学之所失。

其四，范式的作用是聚集力量。范式并不能拒绝争鸣。争论，自然可以深化对许多问题的研究；但总是争论而缺乏共识，学科便难以发展。当旧的研究范式逐渐失去生命力、失去吸引力，当它的研究空间已经填满之时，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期待和呼唤新的研究范式的产生，期待新旧范式交替之际产生的巨大冲击力，更期待新的范式吸引一批坚定的拥护者，形成紧密的科学共同体，从而将古音学研究再度推向深化。

其五，可以说，汉语古音学完成的是有根据的假设与推断。而这种不确定性正是学科的魅力所在：既允许充满乐趣、启人心智的想象，更练就敏锐缜密、一丝不苟的思维。正如永远不可能有确切的答案解释人类如何诞生、生命缘何出现、宇宙如何轮回，永远不可能画出真正的恐龙，永远无法真实地描绘出生物进化的每个细节一样，汉语古音学也永远不可能描绘出古音的真实面貌。探索未知、解释未知、接近未知为科学研究提供无穷的动力。有限的七巧板可以拼凑出无限的可能，但真正的科学拒绝没有根据的杂乱拼凑。用体系严密的理论模式，以充足的科学论据展开令人信服的论证，汉语古音学取得一次又一次的突破与飞跃。

汉语古音学既要扎根于文献，又要于文献之外寻找各种材料，重构上古音的工程浩大而复杂。对汉语古音学开展比较研究，既是对已有成果的传承，又能为将来的研究提供借鉴。治学之路漫长而



艰辛，既然选择了这条道路，就应该锲而不舍、全心投入。希望陈芳博士能以此书的出版为新的起点，更加勤奋扎实地开展科研工作，为学界奉献更多高水平的佳作。

总之，我觉得陈芳博士能运用历史比较语言学方法来分析汉语古音学，提出了许多新的理论观点和见解；阐述的理论前提科学，研究方法科学适当，概念明确，逻辑严密；引证规范，所有引用的资料、观点来源清楚；对解决汉语古音学研究有重大的推动作用。她的《汉语古音学比较研究》值得推荐。

目 录

绪 论 古音学研究历史回顾	(1)
第一章 顾炎武的研究模式与古音学的繁荣	(12)
第一节 顾炎武研究模式溯源	(12)
第二节 顾炎武与毛奇龄研究模式的比较	(17)
第三节 顾炎武研究模式的发展	(23)
第四节 顾炎武研究模式的实践成果 (一): 古韵分部的比较	(30)
第五节 顾炎武研究模式的实践成果 (二): 上古声调的争论	(55)
第六节 顾炎武研究模式的局限:通转合韵说的困境	(66)
第二章 高本汉的研究模式与古音学的飞跃	(86)
第一节 高本汉对谐声原则的突破及其贡献	(88)
第二节 学界对高本汉谐声原则的探讨	(95)
第三节 高本汉研究模式的争论及其发展 (一): 单声母	(103)
第四节 高本汉研究模式的争论及其发展 (二): 复辅音声母	(114)



第五节	高本汉研究模式的争论及其发展（三）： 介音	(130)
第六节	高本汉研究模式的争论及其发展（四）： 主要元音	(139)
第七节	高本汉研究模式的争论及其发展（五）： 韵尾	(149)
第三章	古音学研究的理论反思	(162)
第一节	再思考：上古音与清代古音学的研究对象	(162)
第二节	辨“古音韵至谐说”——兼谈清代古音学 的立论基础	(172)
第三节	历史语言学的贡献与汉语古音学的新成果	(184)
第四节	古音学研究范式及其流变	(194)
第五节	上古音的模糊描述与精确构拟——古音学 发展路径之观察	(202)
结 语	总结与展望	(210)
参考文献	(217)
后 记	(225)

绪论 古音学研究历史回顾

无数哲人与科学家终其一生，或许只为了探索宇宙起源之谜、地球起源之谜、生命起源之谜、人类起源之谜、语言起源之谜……

语言，可谓人类最伟大的创造。

语言与文化互为表里，密不可分。没有语言，文化便难以生长与传播。而语言，于文化的繁荣与碰撞中发展、成熟，分化、统一……任何一种文化都有它的源头，任何一种语言都有它的祖先。不同的来源、不同的历史，造成千变万化的语言。

人们使用语言、创造语言，却难以彻底破解语言的密码。无论是语言的内在结构还是发展历史，都有无数的未知领域，留待人们不断探索。

汉语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语言之一。汉语的演变是个极有趣也极深奥的问题。破解汉语起源之谜，尽管要走过永无止境的漫漫长路，执着向前的脚步却从未停止。

“古音”与“今音”是相对应的两个概念。古音，在传统音韵学上，指的是上古的语音系统。^①古音学，即以汉语上古音为研究对象的专门学问。

一般认为，汉语古音学真正成为一门成熟的学问始于清代，在古音学不

^① 王力：《汉语音韵》，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136页。



长的发展历程中，经历了多个发展阶段。各个发展阶段不可能有泾渭分明的界限，同一个时期常常并存着不同的研究模式。从研究模式入手，不难看到汉语古音学清晰的发展脉络。

（一）清代以前

汉语古音学经历了漫长的萌芽期。古人研究上古音的最初动力十分简单，即发现“古音不同于今音”。

汉朝是经学最为昌盛的时代，朝野内外诵读经书蔚然成风，《汉书·韦贤传》引民间谚语说“遗子黄金满赢，不如一经”。东汉去古未远，但语音已经发生了变化。人们在读经的过程中开始注意到古今音的一些变化。郑玄《毛诗笺》、刘熙《释名》都曾发现某些字古今发音不同，之后便出现了关于古今音的各种解释。

东晋徐邈的“取韵”、北周沈重的“协句”、隋唐陆德明的“协韵”都是用自己的音来读《诗经》，觉得某字不合，就临时改为自己认为合宜的音。到南宋，朱熹提出“叶韵”说，改读字音的做法盛行一时，直到明末，还拥有诸多的追随者。另一方面，吴棫、徐葳、郑庠、戴侗、杨慎、焦竑、陈第、方以智等人着力探求古音的真实面貌，以不同的方式对“叶韵”说进行反驳，逐步建立起古音学的研究框架。

这一阶段古音学尚未成为一门独立的学问，原因在于人们还未找到科学的理论去解释古今音之间何以会有差异，没有找到构建上古音面貌的科学方法。但清代之前各家对古音的探索为清代古音学的鼎盛与繁荣做好了准备，吴棫的“古韵通转说”、郑庠的古韵分部、陈第的“语音时地观”等，直接孕育了清代古音学的辉煌。

（二）清代初期

顾炎武被誉为古音学研究的奠基人，将古音学推向成熟规范的发展阶段。然而，顾炎武的学说并非一开始就有绝对的优势。清代初期，关注古音、潜心于古音研究的人越来越多，但论争十分激烈。“古韵通转叶音派”“叶音派”等各种古音学说与顾炎武等人倡导的“古本音派”相互抗衡。顾炎武的《音学五书》对保存古音的各种历史材料作了几乎穷尽式的分析，其材料之丰富、内容之精深、态度之严谨令人折服，是考据学的杰作。

顾炎武的重要贡献在于：1. 牢固树立语言发展的历史观，强调“古诗无叶音”。2. 明确《诗经》的重要地位，认为“《诗》之音即古本音”。3. 寻找

到可供参照的韵书，“离析唐韵”以求上古韵部，创造了“沿流而溯源”“借今音离合以求古音”的重要考证方法。有了正确的语言观念、明确的研究对象、科学的研究方法，清代古音学的研究模式日趋成熟。那些曾经与“古本音派”相抗衡的古音学说渐渐被人遗忘，失去竞争力。

（三）清代中后期

顾炎武之后，古音学进入了“前修未密，后出转精”的鼎盛阶段，出现了许多重要的古音学家与古音学著作。江永、段玉裁、戴震、孔广森、王念孙、江有诰等古音学家基于顾炎武创造的研究范式，将上古韵部研究推向顶峰。这一时期值得关注的内容有：1. 谐声推演理论。2. 通转合韵说。3. 音系格局的安排。4. 几个争论较大的韵部。

相对于韵部研究，声母的研究成果十分有限，清儒凭借有限的例证和简单的归纳，发现“古无轻唇音”“古无舌上音”等重要规律，实属不易。《诗经》等韵文材料难以提供声母发展的丰富线索，古声母研究需要引入新的材料与理论。

理论模式与研究范式的确定可以促使学科走向繁荣；但另一方面，单一的研究范式不管多么盛行，一旦没有新的材料与新的理论，终将停滞不前。

清代后期，古音学止步不前，急需引入新的理论与方法。

（四）清代以后

高本汉开创了汉语古音学新的发展阶段。他最大的贡献是带来西方历史比较语言学的研究方法，系统地研究汉语上古音。这是在西学东渐的大环境下，汉语古音学保持生机、延伸研究空间的必然选择。这一时期汉语古音学的重要突破在于：1. 更加重视音节和音系结构的分析，为上古音节构拟音值。2. 将“同谐声必同部”的理论系统运用于上古声部。3. 研究材料的扩充：重视汉语现代方言对构拟古音的作用，认识到汉藏语同源语言的材料对研究古音的价值。

这一阶段的论争亦是极其激烈的，参与辩论的有高本汉及其前后的西方汉学家（艾约瑟、马伯乐、西门华德、钢和泰等），还有众多中国的学者（汪荣宝、章太炎、钱玄同、林语堂、吴其昌、陈独秀、罗常培、魏建功、董同龢、陆志韦、李方桂等）。高本汉的研究尽管有诸多缺憾，但他的“直线型理论”成为研究汉语语音史的重要框架之一，而他关于古音学研究的诸多理论与方法也成为古音研究的重要范式。



高本汉之后，汉语古音学的研究队伍不断壮大，研究成果十分丰富，同时，也伴随着各种争论。

1. 海外学者的成长与各种理论模式的崛起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当中国大陆的古音学研究趋于沉寂时，海外学者为主体的研究队伍（李方桂、张琨、罗杰瑞、梅祖麟、余霭芹、杨福绵、蒲立本、白葆罗、马提索夫、包拟古、薛斯勒、白一平、柯蔚南、雅洪托夫、富励士、滕堂明保、赖惟勤、平山久雄等）对中国古音学投入了巨大的热情。他们大多非常重视利用汉藏语系的研究成果来构拟汉语古音。这一时期海外汉学家运用多种理论模式研究汉语上古音。如高本汉直线型理论、张琨的差异性理论、罗杰瑞的“方言逆推研究法”、桥本万太郎的“推移”模式、王士元的“字（词）扩散理论”等。^①

2. 研究环境的改善与研究队伍的壮大

20世纪八九十年代，研究重心回归本土，参与研究的中青年学者多，研究成果多。中国大陆逐步开放的大环境为汉语古音学的研究提供了自由的发展空间，各个高校、科研部门的研究队伍不断壮大。

国外汉学家的大量研究成果在这个阶段被译介到中国来，大大扩展了研究者的视野，海内外的研究同步发展、相互促进。比较活跃的海内外学者有：王力、严学窘、邢公畹、喻世长、黄典诚、邵荣芬、李荣、周法高、俞敏、张琨、余迺永、丁邦新、龚煌城、竺家宁、何九盈、李新魁、潘悟云、杨剑桥、麦耘、李葆嘉、冯蒸、施向东、郑张尚芳、白一平、梅祖麟等。

这一阶段值得关注的内容有：

(1) 对古音学史（特别是清代古音学史）的评述成果日渐丰硕。

(2) 关于汉语上古音的韵部系统的构拟取得巨大进展，韵部系统的构拟已十分细致。

(3) 汉藏语系大量研究成果的利用使构拟上古音的声母成为热潮。

3. 日益密切的交流与理论模式的激烈碰撞

进入21世纪，以梅祖麟《有中国特色的汉语历史音韵学》（2001年）的发表为起点，拉开了针锋相对的学术论争。这场论争涉及面广、振荡强烈、持续时间长，是汉语古音学史最不可忽略的论争之一。这场论争直至今日还

^① 李葆嘉：《当代中国音韵学》，广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在继续。梅祖麟、郭锡良、麦耘、陈新雄、冯蒸、潘悟云、郑张尚芳、耿振生等先生是站在这场论争最前沿的学者。

其实，这场论争早在 20 世纪 90 年代末就已开始酝酿，关于不同学派、不同研究方法的思考已在各种论著中出现。如郑张尚芳《上古音研究十年回顾与展望》（《古汉语研究》1998 年第 4 期、1999 年第 1 期）、潘悟云《高本汉以后汉语音韵学的进展》（《温州师范学院学报》1998 年第 2 期）、冯蒸《中国大陆近四十年汉语音韵研究述评》（冯蒸《汉语音韵学论文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年版）等论著就已开始对汉语古音学的研究成果与研究方法进行总结和反思，冯蒸的《论汉语声母上古声母研究中的考古派与审音派——兼论运用谐声系统研究上古声母特别是复声母的几个问题》（《汉字文化》1998 年第 2 期）更是从研究方法着手，区别上古声母研究中的考古派与审音派。这些评述基本能客观冷静地评述不同的研究范式，而梅祖麟过于偏激的言语则点燃了冲突的导火线，致使这场论争有了过多不具学术意义的火药味。

其实，一门学科、一种学问要走向繁荣，论争是不可避免的。没有论争，对诸多问题的思考与研究就难以深入。但无谓地斗争、诋毁，变学术论争为人身攻击或专断压制，都极不利于良好学术氛围的形成，都将阻碍学科的发展，都有悖学术研究的初衷。静下心来研讨不同学派的理论模式、研究范式，分析其优劣长短，不同学派之间互相借鉴、互相促进，古音学研究才可能迎来新的鼎盛阶段。

二

对于清代古音学史，论述得最为全面深入的要数王力的专著《清代古音学》。^① 其后的许多语言史著作及音韵学通论性著作，皆鲜有突破，难以全面呈现清代古音学的鼎盛面貌。当然也有个别专著的论述颇有特色，如李开《汉语语言研究史》《汉语古音学研究》侧重于剖析古音学家取得的成绩与存在的不足，李葆嘉《当代中国音韵学》对清代传统古声纽的论述颇为深入。

对于清代古音学的评述，更多的是集中于对个别古音学家的深入研究。《清代古音学》中所提及的顾炎武、江永、段玉裁、戴震、孔广森、王念孙、

^① 王力：《清代古音学》，《王力文集》第 12 卷，山东教育出版社，1990 年版。



江有诰、章炳麟、黄侃等人的重要古音学著作几乎都已被系统深入地研究过，一些影响较小的古音学著作也逐渐受到关注。张民权《清代前期古音学研究》（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更是挖掘了“一大批我们熟悉的、半生不熟的或完全生疏的古音学家和古音学或跟古音学有关的著作”。而李开先生的《汉语古音学研究》对江永、戴震、黄侃等人的著作作了深入研究。

对于清代以前古音学的研究，近年来也有较大的突破。关于吴棫、程迥、郑庠、朱熹、陈第、杨慎、方以智等人的古音学思想，均有系列研究成果问世。

对现当代古音学史的评述研究主要集中于综述性的论文及各种论著之中。张世禄、李新魁、马重奇、郑张尚芳、潘悟云、冯蒸等先生的综述文章都是重要的参考资料。何九盈的《中国现代语言学史》，李开的《汉语语言研究史》，唐作藩、耿振生的《二十世纪的汉语音韵学》，杨剑桥的《现代汉语音韵学》，李葆嘉的《当代中国音韵学》，分别对中国现当代古音学的研究成果作了独到的评述。李无未主编的《音韵学论著指要与总目》也较为全面地记录了现当代汉语古音学的研究成果。赵秉璇、竺家宁主编的《古汉语复声母论文集》收集的22篇复声母的论文，也是非常宝贵的资料。商务印书馆的《音韵学方法论讨论集》、上海教育出版社的《境外汉语音韵学论文选》展示了汉语古音学研究的不同视角。冯蒸近年来发表了系列论文，展开对汉语上古音特别是汉语上古声母研究的深度讨论，力图以公允的视角评述学界的相关研究，总结了汉语上古音研究的理论与方法。

当然，研究现当代汉语古音学史的理论模式，不能不关注现当代学术史中关于古音学的多次大讨论。主要有以下几次重要的讨论：第一次（1923—1925），讨论的焦点是关于上古音的研究材料的使用问题，代表人物是汪荣宝和章炳麟等。第二次（1923…1928—1933…1938），围绕古音的构拟尤其是尾辅音的构拟展开讨论，中心人物是高本汉。第三次（1930—1935），主要围绕上古阴声韵的主元音构拟问题进行讨论，主角是林语堂、李方桂和高本汉。^①第四次讨论即梅祖麟事件后的激烈论争。针锋相对的论争中难免有各种过激的言语与不客观的评论，但其中亦不乏对不同理论模式的深度参考。

^① 李开：《现代学术史关于古音学的三次大讨论》，《汉语古音学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三

梳理古音学史，剖析各种研究模式，将促进当代古音学走向良性发展、收获更加丰硕的成果。期待有更多的研究者能共同潜心于这一领域，促进汉语古音学的发展壮大。

方块汉字记录着华夏文化，留下丰富的书面文献；浩瀚的历史文献，展示了文字的形体变化、词汇的繁衍与消亡、语法的缓慢变化和修辞的丰富多彩，却难以直接呈现语音的发展变化。

方块汉字的魅力在于，它可以穿越时空，让异时、异地的人们相互沟通。文字让前人垂后，后人识古。人们可以用各自的方音诵读相同的文本，亦可用现代的语音诵读先秦的文献，甚至是甲骨文和更古老的文字。

追溯语音的历史极富挑战性。而汉语上古音，因为没有韵书可供参考，成为汉语语音史中最富吸引力的前沿领域。人们总想探知，同样的文本，古人的读法有何不同？

愈是难以到达，就愈能激发研究的热情。对历史语音的探求，固然有解经释词等实用的目的，同时也是为了满足人们对未知的探索欲望。有韵书时代的语音，不难借助韵书了解概貌；无韵书时代的语音，则要从文献中淘检历史语音留下的种种碎片，精心拼接还原。

语音的发展过程是有迹可循的，因为语音的变化是有规律的。

语音系统是相对稳定封闭的系统。其发展演变十分缓慢，而它的每次变化往往都是某些规律作用的结果。

19世纪，欧洲青年语法学派痴迷于语音规律的探求。雷斯琴1876年在《斯拉夫—立陶宛语和日耳曼语的名词属格》中首次公开提出“语音规律无例外”观念。

他们认为：“每个语音变化，由于它是机械地出现的，所以它都按规律发生，不允许有任何例外……”^①

19世纪的七八十年代，青年语法学派的许多成员都致力于发现和证明语音规律。但他们很快发现，他们过于夸大语音规律的绝对性，语音变化和自

^① 徐通锵：《历史语言学》，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13页。



⋮

⋮

然规律不同，并非机械地发生，“没有一个规律是没有例外的”。

例外和规律总是联系在一起的，没有规律，也无所谓例外。“例外考验规律。通过例外的分析研究，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掌握规律”。^①

例外是语言研究的一个难点。每一个例外差不多都需要进行特殊的研究，例外的研究可以成为观察语言演变因果关系的一个窗口，有重要的方法论价值。

维尔纳 1872 年把“没有一个规律是没有例外的”改为“没有一个例外是没有规律的”，“那就是说，曾支配一个语言的规律倘有任何例外的话，这例外一定另有原因”。^②

而在中国，对语音规律的探求有更加久远的历史。汉语音韵学是一门博大精深的学问。汉语等韵学对于声韵调的精细分析可谓达到极致。

汉语古音学的发展，是汉语音韵学在更高层面上的创获。尽管汉语古音学直到清代才发展成熟，但清儒在短短两三百年间让古韵分部臻于完善，足以令世人刮目相看。清儒为何能重构出上古音的面貌？其根本原因是他们寻找到语音的发展规律，并建立起能够解释这些规律的理论模式。如果没有严密的理论解释语音发展的规律，就不可能顺利地构建起令人信服的历史语音系统。

四

人类对语言的系统研究往往源于和服务于语言的使用。这种研究首先指向语言的内部。而揭示语言规律，是一项十分复杂的工作。要想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就不能停留于语言的内部，而要展开各个层面的比较研究。

1898 年，《马氏文通》的出版，使语言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从此开启了对汉语语音、词汇、文字、语法、修辞等的全方位研究。语言学的研究成果对语言的教学和使用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而不断丰富的语言生活也对语言研究提出更高的要求，要求人们不断去揭示语言最本质的规律。

从汉民族内部的充分交流，到各民族的团结融合，从西学东渐，到主动

① 徐通锵：《历史语言学》，商务印书馆，1996 年版，第 121 页。

② 徐通锵：《历史语言学》，商务印书馆，1996 年版，第 111 页。